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五期
2013 年 12 月　頁 147-173

臺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

陳　國　球*

摘　要

作爲一個集體的概念，「香港文學」進入受眾的視野，有一個緣起的歷程。從「香港文學史」的角度而言，了解「境外」對「香港文學」的品評觀點有著更爲重要的意義。因爲「流動」與「越界」一直是香港文學的重要特色，有必要從內在與外緣的諸種因素以觀測其構成與意義。本文則嘗試以臺灣與香港之間的文學流通作爲審思對象，從一個特定的流轉方向出發，討論「香港文學」進入臺灣視野的不同表現，作爲以後更全面探討論香港文學與臺灣文學以至其他地區互動的準備。

關鍵字：香港、文學、臺灣、選本、期刊

* 作者現任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講座教授。

airiti

Hong Kong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iwan

Chan Kwok-kou

Abstract

"Hong Kong literature," as a collective concept, has received attention only after going through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ong Kong literary history," it is essential to investigate how people from the "outside" conceive "Hong Kong literature." An examination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in both local and non-local context is ineluctable, for achieving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its structure and significance because "fluidity" and "boundary-crossing" ar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is a close examination of literary interac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aiwa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presence and reception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in Taiwan in different periods, it can become a foundation to lead for furth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on Hong Kong's literary interactions with Taiwan, and other areas.

Keywords: Hong Kong, Literature, Taiwan, Anthologies, Periodicals

airiti

臺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

陳 國 球

一、前言

「香港文學」看似是很具體的存在於今，尤其當我們想到一篇一篇的作品時。然而，作爲一個集體的概念，它之進入於受眾的視野，卻有一個緣起的歷程。因爲「文學」一語前面冠以「香港」兩字，說不上有一段悠長的歷史。「香港」給不少人的印象，或者「想像」，就是「浮躁」、「淺薄」。魯迅（1821-1936）1927 年訪港以後發表了三篇談香港的文章，大大嘲弄了香港作爲殖民地與封建殘餘沆瀣一氣的醜陋面貌。[1] 樓適夷（1905-2001）在1938 年寫〈香港的憂鬱〉，將今天被文學史家視作「香港文學」重要載體的副刊，標籤爲「淫穢」；讀副刊上連載小說的人，是「恬然無恥」。[2] 1970-1971 年臺灣學者胡耐安（1899-1977）在香港某所大專院校客座，寫下〈香港三筆〉的系列文章；他筆底下的香港，「一語了當，『聲色犬馬』而已」，又說：「最無聊的是那些個邪惡報紙『副刊』裡之『聲色俱厲』的『誨淫誨盜』的短長篇，其大膽的描寫，實在是不便卒讀。」[3]1978 年臺灣文學界的尉天驄對香港有更嚴厲的批評，他在〈殖民地的中國人該

1 魯迅：〈略談香港〉，《而已集》；〈再談香港〉，《而已集》；〈述香港恭祝聖誕〉，《三閑集》；載《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卷3，頁427-437、頁535-542；卷4，頁51-55。

2 適夷：〈香港的憂鬱〉，《星島日報》星座第109 期，1938 年11 月17 日。

3 胡耐安：〈香港走筆〉，《香港三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 年），頁4。

寫些什麼？〉一文說：「今天，在國際上一談起香港，就會令人想到它的販毒走私、它的色情氾濫……等等」，有些人「透過高樓大廈、燈紅酒綠、燕瘦環肥、賭狗賽馬……，不知不覺中散布了比鴉片更令人癱瘓的麻醉劑。」[4]

我們明白，這些評論自有其時代帶來的「文化潔癖」，以及伴隨而至的居高臨下的視角；而香港文化於境外所受品評的出發點，往往是針對那些帶有冒犯性質的感官刺激。

從「香港文學史」的角度而言，瞭解「境外」的觀點其實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因爲「香港文學」根本不容許一個畫地自限的論述，如果我們不希望把香港文學史寫成「地方誌」中的「藝文志」或者「風土志」的話。「流動」與「越界」是香港這個城市以至香港文學的重要特色，有必要從內在與外緣的諸種因素去觀測其構成與意義。本文嘗試以臺灣與香港之間的文學交通作爲審思對象，從一個特定的流轉方向出發，討論從二十世紀 1950 年代到 1997 年香港政權轉移之間，「香港文學」進入臺灣視野的不同表現。

二、香港文學在臺灣

（一）五、六〇年代詩人、詩學的交流

「香港」的「地方」（place）意義，[5] 在 1949 年國共戰爭帶來的中國政局變化中最容易爲人感知。國民政府敗退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這個大變動的過程中，隨國府到臺的軍民有百多萬，香港人口亦大增；其中文化人因爲各種原因——包括政治信念之差異和對

[4] 尉天驄：〈殖民地的中國人該寫些什麼？——爲香港《羅盤》詩刊而作〉，《夏潮》第 5 卷第 4 期（1978 年 10 月），頁 71。

[5] 本文所謂「地方」與「空間」的觀念對照，主要借用段義孚的論述，見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前路的取捨，選擇了不同方向的遷徙流動。自五〇年代開始，因爲世界政治勢力的組合變化，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與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大陸地區之間，區隔比較明顯；反而和臺灣的交往，屏障相對稍爲少一些。港臺的文學交流，尤其五、六〇年代，對兩地的文學發展有相當深遠的影響。本身從上海移居香港，以後成爲香港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的劉以鬯，曾據親身經歷寫成〈三十年來香港與臺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對此有相當詳實的記敘。[6] 往後鄭樹森、楊宗翰、王梅香、吳佳馨等續有補充。[7]這些論述對我們思索相關問題都很有幫助。

五〇年代的港臺文學之間最見互動痕跡的是「現代主義」詩學的流播。例如馬朗在香港主持的《文藝新潮》與紀弦在臺灣編的《現代詩》，就有緊密的聯繫。《文藝新潮》（1956 年 3 月—1959 年 5 月）曾在第 1 卷第 9 期（1957 年 2 月）刊載「臺灣現代派新銳詩人作品輯」，收入：林泠〈秋泛之輯〉、黃荷生〈羊齒秩序〉、薛柏谷〈秋日薄暮一輯〉、羅行〈季感詩〉、羅馬（商禽）〈溺酒的天使〉等詩；又在第 1 卷第 12 期（1957 年 8 月）刊出「臺灣現代派詩人作品第二輯」，收錄：林亨泰〈二倍距離外二章〉、于而〈消息外一首〉、季紅〈樹外兩貼〉、秀陶〈雨中一輯〉、流沙〈碟形的海洋及其他〉等詩。與此相呼應的是《現代詩》第 19 期的「香港現代派詩人作品輯」，當中包括馬朗〈島居雜詠〉、貝娜苔〈香港浮雕〉、李維陵〈秘密外一

6 劉以鬯：〈三十年來香港與臺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見蝦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169-184。

7 鄭樹森：〈1997 前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仲介〉、〈五、六〇年代的香港新詩〉，《縱目傳聲》（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4 年），頁 227-254、頁 255-268，〈東西冷戰、左右對壘、香港文學〉，收於馮品佳主編：《通識人文十一講》（臺北：麥田出版，2004 年），頁 165-172；楊宗翰：〈臺灣《現代詩》上的香港聲音——馬朗、貝娜苔、崑南〉，《創世紀》第 136 期（2003 年 9 月），頁 140-148；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〇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臺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吳佳馨：《1950 年代臺港現代文學系統關係之研究：以林以亮、夏濟安、葉維廉爲例》（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airiti

章〉、崑南〈詩兩篇〉、盧因〈追尋及其他〉等詩。此外，兩刊還有刊載兩地作者其他作品和翻譯，而「現代詩社」又是《文藝新潮》在臺的總經銷。[8]延續這種文壇交往的顯著例子還可見於葉維廉、崑南、李英豪在香港辦的《好望角》與臺灣洛夫、張默、瘂弦創辦的《創世紀》詩刊。兩刊的作者群常有重疊；李英豪更被邀任《創世紀》的編輯委員。[9]

臺灣出版的詩選正式收入香港詩人作品者，也首見於1961年出版、由瘂弦（1932-）和張默（1931-）主編的《六十年代詩選》，當中有馬朗〈焚琴的浪子〉等8首和崑南長詩《喪鐘》（節錄），以及已從香港到臺灣師範大學留學的葉維廉〈賦格〉其一至其三和〈逸〉。數年之後，張默、洛夫、瘂弦又編成《七十年代詩選》，當中亦有收入葉維廉（1937-）、戴天（1937）、馬覺（1943-）、翱翱（張錯）、蔡炎培（1935-）等「香港」詩人的作品。這兩個詩選對香港詩人的介紹，可說別有會心。例如《六十年代詩選》論崑南說：

> 由早年的憤怒到咒罵到冷漠到認可其存在面的價值，崑南的文學經驗與教育在「淨化之爐」香港的焚燒之下是相當痛苦而深長的。[10]

《七十年代詩選》編者介紹蔡炎培說：

> 蔡炎培是僑居香港的青年知識份子。……他的詩，情感豐富極了，每一句，每一段，他把熾熱的情感鋪陳得多麼勻貼！那是一個現代中國青年，在飽受離亂之苦後所展示的心意，啊！那

8 參見《現代詩》第19期（1957年8月），頁43，以及〈編輯後記〉，《文藝新潮》第1卷第12期（1957年8月），頁51。

9 參見張默：〈《創世紀》大事記：1954-1970〉，《現代文學》第46期（1972年3月），頁123-135；陳國球：〈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與李英豪的文學批評〉，《中外文學》第34卷第10期（2006年3月），頁19。

10 瘂弦、張默主編：《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1961年），頁110。

airiti

顆心是多麼渴望一種和平與安定。[11]

這兩段編者的話，大概是當時臺灣視野的反映。香港的詩人，可以被容納於一個想像的「中國」，這時「香港」指向一個「僑居」的空間；香港又可以是「淨化之爐」把詩人的「現代」意義鍛煉成型。事實上，「現代中國」的政治和文化想像，對「香港」概念之建立，同時具有正反的作用。

至於不限於新詩的臺灣文學選本而收入香港作家者，就以1972年鄭臻編的《憤怒的與孤寂的》最值得注意。這個選本以《大學雜誌》所載的文學作品爲主，當中收有也斯的散文，綠騎士、翱翱的小說，溫健騮、袁則難、葉維廉的詩。在〈作者簡介〉部分，也見到幾種不同的方式介紹這些作家的身分歸屬。如也斯是「香港詩人」，袁則難是「現肄業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的香港詩人」，綠騎士則是「旅居香港的女作家」、溫健騮是「畢業於政治大學的香港僑生」。如果這些判斷出諸主編，則可以見到當時鄭臻的身分認同頗具「流動性」，其自我介紹更完全不提香港。[12]

（二）七〇年代臺灣出現的香港文學選本

我在〈「選學」與「香港」——香港小說選本初探〉一文曾討論過各種香港文學選本中的「香港」意義，文中指出1968年由香港中

---

[11] 張默、洛夫、瘂弦又編成《七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1971年再版），頁237。

[12] 參見〈作者簡介〉，收於鄭臻主編：《憤怒的與孤寂的》（臺北：環宇出版社，1972年），頁1-3。當中對鄭臻的介紹是：「本書編者。曾任《文學季刊》、《詩宗》等刊物編委及《大學雜誌》文學部門編輯。《當代德國小說選》（與陳慧樺等合譯）及論集《風向球——歐美文學新潮》（皆由環宇出版社出版）。」鄭臻原名鄭樹森，1948年生於廈門，不久隨家人移居香港，在香港完成中小學課程，再考入臺灣政治大學，開始參與《大學雜誌》等刊物的編輯工作，直到1971年底離開臺灣，到美國加州大學攻讀博士。

國筆會出版的《短篇小說選》，其序言（由筆會會長羅香林執筆）曾揭示出一種以「香港」範圍定邊界的意識；[13] 然而正式在書題上標明「香港」二字的選本，最早可能是1973年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由香港左翼文化人吳其敏撰寫〈後記〉的《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選》。[14] 其次就是1979年在臺灣民眾日報出版社出版，也斯和鄭臻合編的《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和《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15] 據編者之一的也斯說，這兩個「香港青年作家」的選本初稿送到臺灣出版社後，擱置了幾年，後來突然印出，沒有讓編者寫後記、定稿和校對。[16] 也斯另外又與范俊風編了一本《大拇指小說選》，也在臺灣出版。從出版的年份來看，《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和《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雖然較遲，但其編成應較1978年出版的《大拇指小說選》爲先。也斯在《大拇指小說選》的序文說明他期望以此「作爲香港本地作者的一個結集」，可以推想這裡的編選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在編選兩個「香港青年作家」選本的想法。[17] 也斯又說：

---

[13] 羅香林：〈短篇小說選序〉：「住在二十世紀的香港的人們，日常的生活，事物的接觸，家庭和社會的關係，學術和文化的陶融，自然和其他地方和其他時代的人們，多少有點分別。因此，現代住在香港的作家，或住在外地而與香港有文學因緣的作家，他們在香港書刊裡發表的作品，自然就是足以反映二十世紀中期的香港社會和人生的。」收於李輝英、黃思騁主編：《短篇小說選》（香港：香港中國筆會，1968年），頁1-2；又參見陳國球：〈「選學」與「香港」——香港小說選本初探〉，《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8卷第2期／第9卷第1期（2008年合刊），頁81-98。

[14] 〔編者不詳〕：《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選》（香港：香港青年出版社，1973年）。

[15] 也斯、鄭臻編：《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臺北：民眾日報出版社，1979年）。

[16] 參見黎海華整理：〈文藝座談會：回顧前瞻話散文〉，《文藝》第5期（1983年3月），頁34-50。

[17] 事實上，三個選本的作家頗有重複：《大拇指小說選》選自《大拇指週報》上發表的小說18篇，作者包括：蓬草、西西、凌冰、葉輝、梁秉鈞、吳煦斌等；《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收錄作品13篇，作者包括：綠騎士、也斯（2篇）、李國威、鍾玲玲、吳煦斌、蓬草等；《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收錄15人作品56篇，作者包括：溫健騮、綠騎士、蓬草、也斯、李國威、鍾玲玲、淮遠等。

> 我們在這些不同類的作品中，看見當前香港小說作者不同的面貌和可能。……〔他們〕同樣是生活在香港的現實之中，並正設法尋覓一個適合自己的表達對這現實的看法。[18]

由此見到也斯的關注點有二：一是「香港」作爲生活中的「現實」；另一是香港作者「表達現實」的方法。

《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和《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書後同樣附錄了也斯一篇〈影印機與神話〉；然而，也斯這篇文章本是爲他的小說集《養龍人師門》而寫的〈後記〉。[19] 出版社把三本書同時出版，不分皂白都附載此文於其中。這種草率態度，或者可以反映了一種對「香港文學」的看法。他們還爲這兩個選本的封底，撰寫了這樣的話：

> 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我們不信這個邪，我們硬從文化沙漠裡找出來一些散文、一些小說，讓大家來試試這些仙人掌的刺扎不扎手，這些仙人掌的花美不美麗！這是一群香港青年作家在「那種」地方，在「那種」文化背景寫出來的那種帶花帶刺的作品選集，你還敢說香港是文化沙漠？

這段文字沿用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陳腔濫調。所謂「『那種』地方」、「『那種』文化背景」，正是一種對異域由凝視到幻設的態度。「來試試」這些「仙人掌的刺扎不扎手」、「仙人掌的花美不美麗」，好比遊客採購紀念品時的想法。當然這種思維不應是選集原來的編者（也斯和鄭臻）所有，但可以憑此理解「香港」作爲一個符號，一旦交付於好奇賞異者之手，很容易成爲把玩之物，按自己的想像隨意放大縮小甚至扭曲。差不多同時期議論香港的尉天驄，批評香港詩人時談到：

---

[18] 收於也斯、范俊風編：《大拇指小說選》（臺北：遠景出版社，1978 年），頁 1。

[19] 也斯：〈影印機與神話——「養龍人師門」後記〉，《養龍人師門》（臺北：民眾日報出版社，1979 年），頁 255-268。

> 用一整頁的篇幅去討論散文中該不該多用引號，在忘卻中國是什麼樣子的情況下賣弄廉價的鄉愁……。[20]

出發點雖然不同，但冷眼旁觀、居高臨下的姿態則一，香港人如何感受「現實」？爲何以這樣的方式感應「現實」？似乎不在關懷之列。

三、認識「香港」的方法

（一）八〇年代期刊專輯：記憶與記錄

香港的「本土」意識大概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成型。事實上，以「香港」來命名在地的文學活動與成品，亦始見於此一年代。這應該是也斯和鄭臻編輯「香港青年作家」小說和散文的背景，可是這兩個選本在臺灣當時的反應，卻說明了「文學香港」的意義還未能在彼岸有正面的顯示。到了八〇年代，兩岸三地的人民雖然各自仍然過著「非戰時期」的生活，但在政治和社會文化上卻都處於風起雲湧的時期。大陸地區因開放政策帶來新一波的「啟蒙」，而臺灣政治演變驅使政府正式解除自1949年以來實行的「戒嚴令」。至於一直在殖民統治保護傘下免受大陸政治浪潮衝擊的香港，卻因爲中英政府談判而至商定此地的未來歸屬，開始要思考前途的問題。同屬華語地區的三地，各有其現實的理據，去關心域內與境外的關聯。在這個大背景底下，臺灣文壇曾經對「香港文學」作過細意的觀察。

1984年10月《創世紀》「創刊三十周年紀念號」中，有馬博良編的一個「八十年代香港現代詩特輯」，收錄了西西、李維陵、何福仁、吳煦斌、金炳興、俞風、馬博良、草川、康夫、黃德偉、黃襄、梁秉鈞、葉維廉、蔡炎培、戴天等的詩。馬博良也就是《文藝新潮》的馬朗，他遠赴美國以後，一直與香港和臺灣詩壇保持聯繫，

[20] 尉天驄：〈殖民地的中國人該寫些什麼？〉，頁71。

這時他從三藩市回到香港，受邀組編這一個特輯。卷前有他撰寫的〈緒言〉；加上他在次年接受《創世紀》編輯之一張默的訪問，當中也有相當時間談論這個「特輯」，從中我們可以明白其時馬朗對香港文學的看法。[21] 馬朗一直在思考一種「香港特質」，或者香港的「地域性」，並試圖梳理香港現代詩的傳承譜系。馬朗在〈緒言〉中對「香港特質」的解說並實並不新鮮，也就是一般人隨口可以數說的各種印象：「文化沙漠」和「機械文明」、「荒謬」和「奇異」、「資本社會風尚」和「遁世哲學」、「東西文化混雜」等，以及在這夾縫中所滋生的文化生產如「新浪潮」電影、粵語流行曲、攝影和美術、報刊、舞臺技術……。重要的是他在訪談中所提到的，對這些特質的依戀懷想的「歸屬感」。因爲這一種「感覺」、「感情」，於是馬朗感到自己「和香港的現代詩一脈相通，始終有很深的連貫」；同樣，已然離開香港的李維陵、貝娜苔、葉維廉等，「在感情上、精神上，仍然和香港有所聯繫」，都可以「歸屬於香港現代詩的一派」。換句話說，當這個「空間」變成「地方」，當香港此一地理「空間」的物質的、感官的、精神的、文化的諸般色相，融化成「地方感」而蘊藏在於作品之中，「香港文學」就油然而生，無論這些作品的創作者長居香港還是飄零遠方。這就是馬朗所努力解說的，由「歸屬感」顯現出來的「香港的地域性的特質」。

馬朗又以香港現代詩前驅的身分，回溯五〇年代以還的發展歷程，以《文藝新潮》、《好望角》，到《八方》、《大拇指》、《素葉文學》等文藝刊物爲座標，梳理出香港的現代詩譜系，又感慨一直沒有一本反映香港詩歌發展的選本；這也是當時在地文化人憂慮「香港」或將消失於未來時，試圖向「歷史」的象徵世界尋求慰藉的同一想法。馬朗在〈八十年代香港現代特輯・緒言〉中，更表明他對香港現代詩的

[21] 馬博良：〈八十年代香港現代詩特輯・緒言〉，《創世紀》第65期（1984年10月），頁84；張默：〈風雨前夕訪馬朗——從《文藝新潮》談起〉，《文訊》第20期（1985年10月），頁77-88。

airiti

承擔，有所期待：

> 風雨如晦的香港，排山倒海的浪濤又要席捲而來了，是則，這些香港現代詩又豈僅是意味著新現代主義而已，而香港現代詩作者的角色也並不那樣簡單的吧。[22]

這是馬朗作爲「香港文學中人」，透過臺灣的報刊展示他的思考。

然而，我們或可以追問，臺灣讀者，或者說臺灣的文學界，其關注點又在哪裡？《創世紀》詩社同人想到在「創刊三十周年紀念號」中加入這個「香港現代詩特輯」，其意義何在？我們翻檢當年的《創世紀》，可見紀念號前一期的第64 期，有「中國大陸朦朧詩特輯」；往後兩期第67 期，有「大陸詩人作品專輯」。參考蕭蕭發表在《創世紀》「創刊四十周年紀念號」的論文——〈《創世紀》風格與理論之演變〉——的分析，我們知道當時臺灣「戒嚴令」有所鬆動，民眾到大陸探親絡繹於途，而《創世紀》也開始向「大中國詩觀」邁進；[23]「香港現代詩特輯」有可能是附從於這種「大中國詩觀」之下的支流。

但這種理解可能只得其一端，我們應該再參看洛夫在《創世紀》「三十周年專號」的〈且領風騷三十年——代社論〉的講法。洛夫在此重申「在廣義的人文主義基礎上創造純粹文學」的主張，反駁「脫離現實」、「逃避現實」的指控。「現實」在當時臺灣政治氛圍中，一方面是指目下的本土政治及社會生活；另一方面指向「解嚴」前後需要重新認識的中國大陸，包括其迥異的政治體制和文化寄託帶來的諸種想像。洛夫認爲對「外在現實」的平面描述是不足取的，而「詩人對生存空間所產生的獨特感受與思考，以及超越現實表層而獲致的一種形上的醒悟」，才是值得探索的「內在現實」。[24] 馬朗等香港詩人的

---

[22] 馬博良：〈八十年代香港現代特輯．緒言〉，頁84。

[23] 蕭蕭：〈《創世紀》風格與理論之演變——「新民族詩型」與「大中國詩觀」之檢討〉，《創世紀》第100 期（1994 年9 月），頁45。

[24] 洛夫：〈且領風騷三十年——代社論〉，《創世紀》第65 期（1984 年10 月）頁6-9。

現代主義風格，曾經影響一代《創世紀》詩人的詩學方向；重溫舊交情誼，以他山之石攻玉，應有助於超越狹隘的「現實觀」的探索。回頭再看〈風雨前夕訪馬朗〉一文張默的提問重點，我們可以推見這些《創世紀》詩人的關懷所在。張默的問題分兩部分，一是關於《文藝新潮》的歷史記憶，另一關於「香港現代詩」的過去與現在。在第一部分提問中，張默這樣形容他記憶中的這本香港刊物：

> 現在臺灣五十歲以上搞文學的朋友，大家都知道你卅年前在香港創辦的《文藝新潮》雜誌，當時的確氣勢非凡，令人刮目相看，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力。[25]

看來《文藝新潮》在臺灣的影響，實在不亞於在香港本地。至於第二部分的問答，則聚焦於香港現代詩的「地域性特質」，以及想像中香港將面臨的「大轉變」與這「特質」的存滅的可能對應關係。「香港」還會是「香港」嗎？「本土性」與其相關的「地域感」，於八〇年代無論是臺灣還是香港，都成爲一時驚覺的「身分認同」的疑問。馬朗所開啟的「香港現代主義運動」，本就飽含政治的意味，[26] 他編集這個特輯時，也採錄了戴天〈一九九七斷想〉與自己的和詩〈尖沙東的黃昏〉，以及西西〈一枚鮮黃色的亮麗菌〉與蔡炎培〈玫瑰與刺青〉等，分明展示了香港詩人對歷史與未來的究詰。香港的現代詩如何呼應香港的「現實」，或許不無《創世紀》詩人所可借鑒之處。

《創世紀》「香港特輯」之後一年，臺灣的《文訊》月刊由李瑞騰又策劃了一個「香港文學特輯」。這個特輯共123頁，其內容大致可分四類：

（一）香港文學印象

（二）香港文藝刊物介紹

---

[25] 張默：〈風雨前夕訪馬朗〉，頁87。

[26] 參見陳國球：〈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與李英豪的文學批評〉，頁10-14。

（三）香港文藝團體與文藝活動介紹

（四）香港作家在臺出版文藝作品書目

本輯的主要特色是當中的臺灣視野和觀點。策劃人李瑞騰〈寫在「香港文學特輯」之前〉一文析述了時人對香港和香港文學的認知；例如歷史上香港如何由「荒島」經殖民統治而變化成「開放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在中文報業的前驅地位、香港文學在1949年以前因內地作家南來而得滋養，以至1949年後「眞正開始擁有獨自發展的條件」等。李瑞騰又講到臺港兩地的文學互動，指出：「臺灣文學整體而言，對香港文學有積極的影響」，而香港作家又「直接或間接豐富了在臺灣的現代文學」。可是，這個特輯並沒有深入探究臺港的相互影響，而主要是爲臺灣一般讀者介紹「香港文學」，希望「能引起文藝界的朋友對於香港文學的關心與注意，更進而做比較深入的研究」。[27]

事實上，如此用心而且有規模的介紹香港文學，《文訊》這特輯還是臺灣文學界的第一次。它的性質和意義與前此的《現代詩》和《創世紀》現代詩人特輯，以至《六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詩選》收編香港詩人詩作完全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訊》特輯當中各篇論述、訪問以至相關資料的整理，執筆者主要都是來自臺灣；即使作者如劉紹銘、余玉書、岳騫等當時的居住地並不在臺灣境內，但都與臺灣關係密切。因此，這個特輯的觀點和立場明顯是從臺灣出發的。其中「香港文學印象」的系列短文，主要出自臺灣的老一輩作家如穆中南（1912-1992）、郭嗣汾（1919-2014）、魏子雲（1917-2005）等，內容多涉及上世紀五、六〇年代流通港臺的出版物，如《亞洲畫報》、《祖國週刊》、《今日世界》等，也談到當時的兩地的文學獎項、反共文學、難民文學、美援文化等，對我們瞭解這一段臺灣和香港的文學史有相當幫助。

[27] 李瑞騰：〈寫在「香港文學特輯」之前〉，《文訊》第20期（1985年10月），頁19。

至於特輯內有關香港文藝刊物、文藝團體與活動的介紹，資訊範圍較廣，既有當時「正在盛年」，而今天「已成陳跡」的刊物如《開卷》、《素葉文學》、《文藝雜誌》、《八方》等，也回溯五、六〇年代的《文學世界》，七〇年代的《詩風》等；選樣都見眼光。其中秦賢次〈香港文學期刊滄桑錄〉一文更是沿波討源，因枝振葉的精心製作，從《伴侶》、《紅豆》等二、三〇年代的刊物，一直談到1985年剛創刊的《香港文學》月刊，無論在香港或是臺灣，都是前所罕見的重要文學史論述。[28] 刊物介紹部分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就是上文引述的張默〈風雨前夕訪馬朗〉，讓八〇年代的馬朗對五〇年代的自己和《文藝新潮》作歷史的回眸與省思。

此外，《文訊》以「編輯部」名義編成的〈香港作家在臺出版文藝作品書目初編〉也是極重要的資料整理。[29] 香港文學由於沒有政府的扶持（或者「干預」），而且閱讀人口較少，出版市場並不興旺，不少文學作品或相關論著在臺灣出版，才能贏得更多的讀者；而作家們往往得助於臺灣文學體制（例如文學獎）的認可，再把聲譽帶回香港。特輯中有劉紹銘〈香港文學的轉生〉一文，就討論到這一個現象。[30] 因此這個書目不單對港臺文學交流的瞭解有所幫助，更是香港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李瑞騰〈寫在「香港文學特輯」之前〉說：

> 對於香港文學，我們所知畢竟有限，文學界也一直不是很關心，當然更談不上研究了。……不過，即連香港本地對於香港文學的研究，也是最近幾年才熱鬧起來的，所以我們認爲，從

[28] 秦賢次：〈香港文學期刊滄桑錄〉，《文訊》第20期，頁52-76。作者在文末注明：「曾參考香港《文藝》第七期之〈筆談會——香港文藝期刊在文壇扮演的角色〉專輯各文。」但本文所論範圍比〈筆談會〉廣闊得多；參見《文藝雜誌季刊》第7期（1983年9月），頁20-47。

[29] 文訊編輯部：〈香港作家在臺出版文藝作品書目初編〉，《文訊》第20期，頁126-141。

[30] 劉紹銘：〈香港文學的轉生〉，《文訊》第20期，頁40-43。

現在起關切起香港文學，爲時並不晚。[31]

李瑞騰之言是有道理的，過往香港學界對「香港文學」的關注之不足，實在使人汗顏。在此情況下，港人若能多瞭解臺灣如何接受「香港文學」，絕對有助於進一步的自我認知。

（二）九〇年代的期刊特輯：演出與叩問

邁入二十世紀九〇年代，香港的1997問題迫在眉睫，世人紛紛投以好奇的目光；各種討論「香港」的著述在世界各地湧現。值此機緣，「香港文學」也受到青睞，容易成爲議論的對象。臺灣文學界對此亦有相當熱烈的反應，我們選取兩個比較有規模的專輯作爲討論的依據。

1992年《聯合文學》第94期請到與該刊關係頗深的鄭樹森主編一個專號。[32] 雜誌的執行主編初安民在題爲〈香江故事〉的「編輯室報告」中說：

> 我們從來沒有眞正瞭解過香港。
>
> 我們對香港的瞭解，多半是浮光掠影，片斷片斷雜湊出來的印象而已，除此之外，在我們有意無意的忽略中，除了港片等大眾文化工業，帶來一陣魅力旋風外，香港就是印象中的殖民地。
>
> 我們眞的不曾眞正用心去瞭解過香港。不曾瞭解在中國近代史，甚或現代史中，佔有著重要位置的香港。……
>
> 由鄭樹森教授策畫的此一專號，相當程度的勾勒出香港文學的風貌，我們相信，通過本期的介紹，勢必會更能認識香港的豐腴，瞭解香港的歡樂與淚水。[33]

---

[31] 李瑞騰：〈寫在「香港文學特輯」之前〉，頁19。

[32] 鄭樹森曾擔任《聯合文學》的總編輯。刊載此專號的第94期總編輯是鄭愁予；鄭樹森列名編輯委員。

[33] 初安民：〈編輯室報告：香江故事〉，《聯合文學》第94期（1992年8

初安民的講法說明了「香港」在臺灣受眾心目中的形象，直到九〇年代，主要還是電影、電視劇集、流行曲等大眾文化，以至模糊的「殖民地」印象。「香港」是否可以具有更深刻的意義？似乎只是少數人的懸想。《聯合文學》的「香港文學專號」是因應這個不足而作補充的一個嘗試。

這個專號由具有相當「香港」成份的鄭樹森（1948-）策劃，是一個作品與論述兼顧的特輯；內容包括鄭樹森的〈前言〉，以下再分「論介」及創作的「小說」、「詩」、「散文」三種文體類型的作品，末附〈作者簡介〉。鄭樹森在〈前言〉先爲「香港文學」作一定義，劃定其邊界。[34] 緊接的「論介」以〈近二十年的香港文學〉爲總題；據鄭樹森的解釋：「『近二十年』，是以影響深遠的香港《中國學生週報》在1973年的停刊爲分水嶺。」[35] 當中收入黃繼持、俞風、梁錫華、許迪鏘、盧偉力、陳輝揚、李焯雄、梅子、洛楓、小思等，就近二十年的香港的小說、詩、散文、戲劇、專欄、流行文學、南來作家、文藝刊物、文學活動等不同議題，作出簡短的評介。作者都是香港的文學研究者或者出版編輯，對相關活動應該有相當的認識。

創作展示部分限於三種文體類型，而以八〇年代發表的作品爲範疇：小說選錄劉以鬯、西西、也斯、鍾玲玲、辛其氏、黃碧雲、鍾偉民、余非等作品共11篇：詩選入戴天、古蒼梧、關夢南、何福仁、王良和等作品7篇；散文收小思、杜杜、李國威、吳煦斌、

月），頁6-7。

[34] 鄭樹森這篇〈前言〉後來改題〈香港文學的界定〉，收入《從現代到當代》（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

[35] 鄭樹森：〈香港文學專號．前言〉，《聯合文學》第94期（1992年8月），頁17；然而小思（盧瑋鑾）在「論介」部分的〈文學活動〉一文，說：「以1972年作爲本文敘述始點，則不能不先提及由香港大學學生會首辦的『青年文學獎』，它是把文學與社會關連起來的萌發點，對青年一輩愛好文學者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小思：〈文學活動〉，《聯合文學》第94期（1992年8月），頁39。兩種說法各有依據，也各有其道理；只是編者作者之間，似乎未取得共識。

airiti

淮遠、葉輝、游靜等作品10篇。鄭樹森說明是以「狹義的香港文學」爲限，其血脈傳承，看來離不開《中國學生週報》、《大拇指週報》，以至《素葉文學》的系統。

兩年後，1994年，臺灣另一本具歷史的雜誌《幼獅文藝》刊載「1997與香港文學專輯」。在沒有具名的前言中，引用了鄭樹森於1993年12月在臺灣舉行的「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發表的論文要點，[36] 以說明香港過去的「生存狀態」，再以《幼獅文藝》記者近期採訪鄭氏的整理稿——題作〈香港文學・殖民地文學・香港九七以後〉，作爲這個專輯的開端。其下主要部分是《幼獅文藝》的編輯和記者從臺灣親臨香港或者以電話訪問香港文學界和學術界的紀錄；分別是「本刊記者」〈小記《素葉文學》與《香港文學》〉，訪問許迪鏘〔按：原文「迪」誤作「狄」〕和劉以鬯；李慈恩〈九七對話〉，訪問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周英雄、黃繼持、盧瑋鑾、王建元；沈冬青〈觀看・反省・無聲的掙扎——虛構記憶城市的也斯〉；沈冬青〈香江過客半生緣——施叔青和她的香港〉；孟萍〈新移民作家的心路歷程——訪問顏純鈎先生〉。此外，專輯還收入黃維樑〈香港式雜文〉、「香港製造」課程小組〈香港製造：文化研究〉、黎活仁〈香港文壇近況——1994上半年〉。這三篇應是約請香港學界撰寫的短稿。當時黃維樑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一向主張報刊上的雜文應列入香港文學研究的範圍之內；黎活仁任教於香港大學，而「香港製造」則是陳清僑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時所籌設的課程。另外有兩篇〈香港書肆報導〉，分別介紹青文書屋和三聯書店。

對照兩個專輯，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認知態度和認識方法。《聯合文學》的「香港文學專號」是在臺灣文化空間架設了一個舞臺，讓「有代表性」的香港聲音上臺表演。大概因爲雜誌的總編對「專號」

[36] 鄭樹森：〈談四十年來香港文學的生存狀態——殖民主義、冷戰年代與邊緣空間〉；這篇論文後來收入邵玉銘、張寶琴、瘂弦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1995年），頁50-58。

的主持者有絕對信心，除了執行主編的開場白以外，我們再看不到臺灣的觀照立場。故所以這「專號」實在是「香港文學」的走埠登臺。創作部分固然就是原樣呈現，問題只是選樣是否得當，這包括人選和作品選例；細觀之，這些選樣大都經得歷史的考驗。在作品以外的12篇「論介」，照顧了小說、詩、散文、戲劇等傳統文學體裁，補充以可突顯香港特色的形式或者風格類別如「專欄」與「流行文學」、重要的議題如「南來作家」的現象，再加上文藝刊物和文學活動的介紹，輔以〈二十年香港文藝活動表〉，整個專號看來就像一次集體書寫「香港七、八〇年代文學史」的演練。事實上，七、八〇年代是「香港本土意識」在更廣闊的國際形勢下滋養成長的時期，「香港文學」在這個過程有何表現，極具文學史以至文化政治史的意義；而九〇年代是「香港文學史書寫」討論最熱烈（卻從無／無從實踐）的時候。另一方面，臺灣同時也經歷「認同」意識遭逢強烈震盪的時刻，香港文學如何於「國際化」與「本地化」兩個方向之間取徑，對臺灣的文化思考不無一點參考價值。只可惜這個專號中的「論介」的水準參差不齊；個別文章只是簡單意念的宣示，既無歷史意識，也沒有實際具體事例，香港以外的讀者尤其難以得其要領。

至於《幼獅文藝》的「1997與香港文學」則以「未來的可能（憂慮）」作主題。這種對「未來」的憂慮甚至恐懼，在九〇年代的兩岸三地之中，可能是香港所獨有。因爲海峽兩岸的「未來」空間，是有待開發的未知，是寬廣的；而香港，則未知的「未來」，卻以囚籠的幻像出現，教人苦思如何脫困。臺灣讀者對香港當時以至異日的景況，大概也有許多猜想，於是《幼獅文藝》這個專輯的主體，就以時事追訪的方式呈現。相對於《聯合文學》的專號，我以爲這是更加進取的。例如沈冬青訪問也斯的〈觀看・反省・無聲的掙扎〉一篇，有這樣的講法：

> 講起香港的種種，我們好奇的是香港文藝活動的空間究竟有多

> 少，九七的歷史命運對它的影響層面，卻意外發現香港零零星星地存在著也斯這種「自有其不同對抗商業文化的方式」，淵源有自，涓涓成流。他們敏感地意識到自己所處小島的尷尬，也急於要弄清楚生活所在的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世界。觀看和反省並不是因爲九七的迫近才陡然出現，掙扎和抗拒也早就存在這裡那裡一些有心人的工作中。……記憶與觀省，或許就是他們對抗種種巨大力量的方法吧！[37]

以「問題—回應」的方式探索，比起專意聆聽，發現會更多，也揭示了更多的可能。比方說，香港文學人有多少種面對「未來」的態度和方法，不是很值得借以爲鑑嗎？再看李慈恩〈九七對話〉，從盧瑋鑾身上看到另一種「結構感情」的方式：

> 對於香港，不論是寫作或者是學術研究，她處處表現出土生土長的人對這塊土地的感情。……面對數不清的歷史疑問，她仍有最明確的答案：「應該高興，這塊寬容的土地，百多年來，它一次又一次包容了無數等待明天的人。」[38]

透過主動的聞問，可以修正一些遙觀遠望的想當然，可以看到更深邃的歷史；可以感發同情之理解，可以見到更寬廣的天地。這個專輯可議之處，是思見範圍的有限；尤其訪談稿以外的幾篇，幾乎都是率爾操觚之作，雖則撰文者都是「香港人」。

四、參觀一個城市的一個時刻的歷史

「九七」是一個時間標記，隨著不捨晝夜的時間之流，它總會來

---

[37] 沈冬青：〈觀看．反省．無聲的掙扎——虛構記憶城市的也斯〉，《幼獅文藝》第79卷第6期（1994年6月），頁48-52。

[38] 李慈恩：〈九七對話〉，《幼獅文藝》第79卷第6期（1994年6月），頁44-46。

到跟前。《聯合文學》在1997年7月——香港政權移交的日子—組織了一個題爲〈回歸？回憶？——香港的昨日與明天〉的特輯。編者在特輯的前言說：

> 資本主義掛帥的香港、忙碌的香港、霓虹招牌光閃閃的香港、處處名牌的香港，這所有一切的表相和內裡，都將成爲「回歸」的一部分，抑或是「回憶」的一部分？從香港學者到大陸搖滾樂手崔健就在此際聲聲問著我們是要默默的傷感的度過那一天，抑或輕鬆的簡單的超越那一天。[39]

「回歸」是合浦珠還？破鏡重圓？「回憶」是如霧如電？如鏡中象、水中月？當「未來」的不可知延宕了十多年，日子快要來臨了，在臺灣《聯合文學》這個專輯發言的有四名香港讀文學的學人。他們的文題分別是：王宏志〈歷史・國籍・回歸〉；李小良〈香港／中國——權力關係的想像〉；陳國球〈感傷的教育——香港、現代文學，與我〉；陳清僑〈過渡情荒〉。

據知這幾篇文章的作者在撰稿前並無協商，臺灣編者也沒有任何提示或要求；於是，作者們各自意興感發，各照隅隙。王宏志〈歷史・國籍・回歸〉要問：

> 血濃於水。香港毫無疑問是中國的一部分。可是，爲什麼我們在念中國歷史時，香港是如此不重要？爲什麼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和文學史裡同樣沒有香港的蹤影？爲什麼自「前清」以來，大陸文人學者對香港的論述又何其怨毒？[40]

這是呵壁問天的舉措，問世道、問人情。

---

[39] 編者：〈回歸？回憶？——香港的昨日與明天〉，《聯合文學》第13卷第9期（總第153期）（1997年7月），頁36。

[40] 王宏志：〈歷史・國籍・回歸〉，《聯合文學》第13卷第9期（總第153期）（1997年7月），頁38。

陳國球〈感傷的教育——香港、現代文學，和我〉也感傷懷舊：

> 香港，我們的一代，就是這麼一個失去自己身世的孤兒。現在又見老父輩來教我們認祖歸宗；我們的記憶，或許於大家族中話聚天倫時，不無少補；我們的失憶，正好把這段野外求生的經歷忘掉。[41]

分明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李小良〈香港／中國——權力關係的想像〉卻抱此關懷：

> 所謂邊緣跟中心論述的對抗，重點之一是在中心所界定的國族身分和權力架構之外重新再思，但不是要取代中心位置，把自己變成另一個中心，而是……「搬動中心」，變成「多個中心」。[42]

這是樂觀奮進，相信政治權柄有力學物理可以調整轉向。

陳清僑〈過渡情荒〉更搖盪性情：

> 今天，我們目送八九民運在後，眼見九七過渡於當前，左翻右滾，總不知夢去何方，他日安生何在。目下，呼喊之聲已然沉寂，亢奮與激情難再，香港人且抱過渡竟生的在地心情，投身世事，手挽人生。[43]

這是行吟澤畔，看江水之汩汩。

王、李、陳等，同屬一代的香港知識人，在迎向大時代變動時他們選擇在「我城」以外的地方——臺灣——的刊物上宣露心聲，究竟

---

41 陳國球：〈感傷的教育——香港、現代文學，和我〉，《聯合文學》第13卷第9期（總第153期）（1997年7月），頁46。

42 李小良：〈香港／中國——權力關係的想像〉，《聯合文學》第13卷第9期（總第153期）（1997年7月），頁41-42。

43 陳清僑：〈過渡情荒〉，《聯合文學》第13卷第9期（總第153期）（1997年7月），頁48。

有何意義？是否相信這個城市的意義不應限定在「本地」流通，「我城」的歷史時刻要在一個更表廣的地圖上顯現才更有深義？臺灣的文學雜誌，又爲何有興趣構築一個場地，讓這個似遠還近的城市中人抒發牢愁？

這幾篇文章自成一組，《聯合文學》的編者看來並無任何參與。然而，我們看到這個特輯在四名香港人的文章之後，附錄了一篇似乎毫無關連的〈國父於香港大學演講紀略〉。這篇「附錄」，與編者所撰前言，前堵後圍，好像把四篇港人的文章置放在博物館一個展覽箱之內。

「前言」把香港的「過度」的方式，設定爲「默默的傷感的度過」和「輕鬆的簡單的超越」兩個選項；於是，多少濃情怨憤，都可以化成邏輯選項的或此或彼，可以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審視。至於後面的「附錄」，就把建立共和國的孫中山（1866-1925）對「香港」的品評，超越歷史時空揭示於1997年讀者眼前，「再現」這個城市的記憶與想像。孫先生於1923年2月2日在該所「殖民地大學」演講，他說：

> 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回憶卅年前，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得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由此想到香港地方與內地之比較，因香港地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而內地已數千年，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即佈置得如許妥當？……。
>
> 現時香港有六十餘萬人，皆享安樂，亦無非有良好之政府耳，深願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爲榜樣，以香港爲模範，將來返祖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責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達。極望諸生勉之。[44]

[44] 〈國父於香港大學演講紀略〉，《聯合文學》第13卷第9期（總第153期）（1997年7月），頁50-51。

特輯內這一段國父的話，把「1997 的香港」需要思索的種種，布置入歷史和政治構建的框架內。當我們知悉四名發言人其實都是香港大學的畢業生時，更會覺得編者這個安排之恰切；尤其國父的演講場所，就是他們應考大學畢業試的禮堂。

經此排比鋪墊，特輯的主體內容就不再是純粹幾聲哀鳴，而可從文化政治史的角度去理解和感受。準此而言，在臺灣檢視「香港文學」，應該可以超越好奇玩賞，而參之歷史、政治與文化，觀微以知著。至於處於另一端的香港，瞭解臺灣如何觀察「我城」的文學，同時也會增加這個城市的自我認知，有助省思往後的去向。

五、結語

臺灣之認識「香港文學」，渠道當然不止於上文論列的幾項；比方說，個別香港作家屢獲臺灣文學大獎、作品競相在臺灣出版，其實亦非常值得注意；此外，香港的流行通俗小說如金庸武俠，在臺灣文壇甚至社會各階層間，其聲勢之盛，不下於任何其他華文地區；這些現象似乎也可以在本文的總題之下納入討論。然而，由於篇幅所限，我們把這些課題暫時放下。以上我們討論的五、六〇年代港臺之間文學群體交流，七〇年代臺灣首現兩種標明「香港」之詩文選本的特定狀況，八〇年代到九七在臺灣刊物出現的「香港文學」特輯等，相對來說，都是「香港文學」的「集體」形相的表現。相信這個討論焦點，在一定程度上足以揭示臺灣對香港的觀察角度和方式，爲往後更全面探討香港與臺灣以至其他地區之間的文學互動作準備。

airiti

徵引書目

小　思：〈文學活動〉，《聯合文學》第94期，1992年8月。

也　斯：《養龍人師門》，臺北：民眾日報出版社，1979年。

也斯、范俊風編：《大拇指小說選》，臺北：遠景出版社，1978年。

也斯、鄭臻編：《香港青年作家小說選》、《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臺北：民眾日報出版社，1979年。

王宏志：〈歷史・國籍・回歸〉，《聯合文學》第13卷第9期（總第153期），1997年7月。

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〇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臺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初安民：〈編輯室報告：香江故事〉，《聯合文學》第94期，1992年8月。

李輝英、黃思騁主編：《短篇小說選》，香港：香港中國筆會，1968年。

李瑞騰：〈寫在「香港文學特輯」之前〉，《文訊》第20期，1985年10月。

李慈恩：〈九七對話〉，《幼獅文藝》第79卷第6期，1994年6月。

李小良：〈香港／中國——權力關係的想像〉，《聯合文學》第13卷第9期（總第153期），1997年7月。

沈冬青：〈觀看・反省・無聲的掙扎——虛構記憶城市的也斯〉，《幼獅文藝》第79卷第6期，1994年6月。

吳佳馨：《1950年代臺港現代文學系統關係之研究：以林以亮、夏濟安、葉維廉爲例》，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胡耐安：《香港三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2年。

洛　夫：〈且領風騷三十年——代社論〉，《創世紀》第65期，1984

年10月。

秦賢次：〈香港文學期刊滄桑錄〉，《文訊》第20期，1985年10月。

陳清僑：〈過渡情荒〉，《聯合文學》第13卷第9期（總第153期），1997年7月。

陳國球：〈感傷的教育——香港、現代文學，和我〉，《聯合文學》第13卷第9期，總第153期，1997年7月。

陳國球：〈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與李英豪的文學批評〉，《中外文學》第34卷第10期，2006年3月。

陳國球：〈「選學」與「香港」——香港小說選本初探〉，《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8卷第2期／第9卷第1期，2008年。

張默、瘂弦主編：《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1961年。

張默、瘂弦、洛夫主編：《七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1971年再版。

張　默：〈《創世紀》大事記：1954-1970〉，《現代文學》第46期，1972年3月。

張　默：〈風雨前夕訪馬朗——從《文藝新潮》談起〉，《文訊》第20期，1985年10月。

尉天驄：〈殖民地的中國人該寫些什麼？——爲香港《羅盤》詩刊而作〉，《夏潮》第5卷第4期，1978年10月。

馬博良：〈八十年代香港現代詩特輯．緒言〉，《創世紀》第65期，1984年10月。

馮品佳主編：《通識人文十一講》，臺北：麥田出版，2004年。

楊宗翰：〈臺灣《現代詩》上的香港聲音——馬朗、貝娜苔、崑南〉，《創世紀》第136期，2003年9月。

適　夷：〈香港的憂鬱〉，《星島日報》星座第109期，1938年11月17日。

魯　迅：《而已集》，《三閑集》，收於《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黎海華整理：〈文藝座談會：回顧前瞻話散文〉，《文藝》第5期，1983年3月。

鄭　臻主編：《憤怒的與孤寂的》，臺北：環宇出版社，1972年。

鄭樹森：〈香港文學專號・前言〉，《聯合文學》第94期，1992年8月。

鄭樹森：《從現代到當代》，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

鄭樹森：〈談四十年來香港文學的生存狀態——殖民主義、冷戰年代與邊緣空間〉，收於邵玉銘、張寶琴、瘂弦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1995年。

鄭樹森：《縱目傳聲》，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4年。

劉紹銘：〈香港文學的轉生〉，《文訊》第20期，1985年10月。

劉以鬯：《見蝦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蕭　蕭：〈《創世紀》風格與理論之演變——「新民族詩型」與「大中國詩觀」之檢討〉，《創世紀》第100期，1994年9月。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